

苏州家训 选编

王莉 黄晓燕 / 副主编
王卫平 李学如 / 主编

SUZHOU
JIAXUN
XUANBIAN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苏州家训选编

王莉 黄晓燕 / 副主编
王卫平 李学如 / 主编

本书为“苏州市文化研究一般资助项目”

（项目编号：SZ20160305）

SUZHOU
JIAXUN
XUANBIAN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州家训选编 / 王卫平, 李学如主编. —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7-5672-1865-9

I. ①苏… II. ①王… ②李… III. ①家庭道德—苏州 IV. ①B8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40888 号

书 名	苏州家训选编
主 编	王卫平 李学如
责任编辑	倪浩文
封面摄影	倪浩文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 (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215006)
印 刷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mm×1 000 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33 千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2-1865-9
定 价	40.00 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 0512-65225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明清时期苏州家训研究

代序

关于“家训”的概念,学界众说纷纭。学者或以家训的形式,或以家训的内容,或以家训产生的背景等切入,角度不同,从而使得“家训”的定义纷繁多样。在我们看来,朱明勋先生在《中国家训史论稿》一书中对“家训”概念的界定比较全面具体:“家训,就是某一家庭或家族中父祖辈对子孙辈、兄辈对弟辈、夫辈对妻辈所作出的某种训示、教诫,教诫的内容既可以是教诫者自己制定的,也可以是教诫者取材于祖上的遗言和族规、族训、俗训或乡约等文献中的有关条款,或者具有劝谕性,或者具有约束性,或者两者兼具。”^①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家训的研究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徐少锦、陈延斌合著《中国家训史》^②、王长金著《中国传统家训通论》^③、朱明勋著《中国家训史论稿》^④、费成康著《中国的家法族规》^⑤等,对中国传统社会中家训从萌芽产生到成型成熟乃至由盛转衰的过程进行了系统梳理,对家训的思想特点进行了全面考察,对家训的精华和糟粕进行了深入分析,使人们对传统家训有了较为完整的认识。与此同时,学界重视对传统家训文献的整理,涌现出一批家训资料集和通俗读本,如翟博主编的《中华家训经典》^⑥、陆林的《中华家训大观》^⑦、谢宝耿的《中国家训精华》^⑧、李茂旭的《中华传世家训》^⑨、徐少锦主编的《中国历代家训大全》^⑩等。这些读本在内容、形式上大同小异,只是范围、侧重点有所不同。此外,近年来有不少博士、硕士论文也在关注中国传统家训文化,各种期刊发表的论文为数众多,从各个侧面予以解读,从而推动

① 朱明勋:《中国家训史论稿》,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10页。

② 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③ 王长金:《中国传统家训通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④ 朱明勋:《中国家训史论稿》,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8年版。

⑤ 费成康:《中国的家法族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⑥ 翟博:《中华家训经典》,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

⑦ 陆林:《中华家训大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⑧ 谢宝耿:《中国家训精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⑨ 李茂旭:《中华传世家训》,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⑩ 徐少锦:《中国历代家训大全》,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

了家训文化研究不断趋于深入。

不过,除个别论文外,对明清时期苏州的家训进行专门研究的论著几无所见,而这与明清时期苏州的文化重心地位以及家训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显然是很不相称的。因此,开展对明清苏州家训的系统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苏州家训的兴盛及其原因

(一) 家谱与家训的共盛之象

宋光宇教授曾经指出:“明清两代,家谱与家训一起昌盛,而且两者有合而为一的趋势,家训成为家谱之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①陈捷先教授也指出:“到了明朝,随着谱学的进步与发展,家训成为谱书汇中重要的部分,好的谱书必有家训。”^②两位学者实际上指出了家训普遍依谱而生的生存形态,某种程度上而言,有谱必有训。甚至判断一部家谱好坏的标准乃是视其家训的有无,因而家谱的昌盛无疑也是家训的昌盛。

明清时期苏州许多家族十分重视家谱的纂修,无论是世家大族还是寻常百姓,兴修族谱的活动十分频繁,如夫椒丁氏自其明代第十一世任礼公创谱,后世子孙“踵修不一,至民国己未凡九修”^③,他们“诚恐年久不修,难免失考之虞”^④。多数家族恪守“三十年一修”的重修之期,对于无力或不能按期重修表现出明显的焦虑,如道光年间常熟归衡在家族谱序中追溯前次的修谱时间,“自康熙中叶迄今已百数十年,距嘉庆中修谱之时亦将已四十年矣”,明显流露出对家谱“近四十年一修”的遗憾^⑤;洞庭南徐徐氏对家谱的重修之期更为期待,要求平时即应积累资料,“修谱牒古人论定为三十年一修,但必经始于平时,乃能精详于临事,每岁春祭之日,子孙群集,各房录其生死之数,令值祭者收藏于笥,岁终录成草谱一册,然后修谱之岁可以据草直书,无事访求”^⑥。不难看出,此番议论将“家谱的重修”上升至修谱定式的制度层面。

明清时期苏州家谱的确切数量无法计算,因家谱、族谱均系私家纂修、保存,数量庞杂,且经历代兵乱等各种社会动荡与浩劫,致使私家所藏的家谱散佚亡失现象严重。有鉴于此,笔者只能对“世界上收藏中国家谱原件最多

① 宋光宇:《试论明清家训所蕴含的成就评价与经济伦理》,《汉学研究》1989年第1期。

② 陈捷先:《清代族谱家训与儒家伦理》,《第二届亚洲族谱学术研讨会会议记录》,台北市联经出版社,第161-162页。

③ 《丁氏宗谱》“夫椒丁氏族谱序”,上海图书馆藏。

④ 《丁氏宗谱》“夫椒丁氏族谱序”,上海图书馆藏。

⑤ 《归氏世谱》“归氏世谱序”,上海图书馆藏。

⑥ 《洞庭南徐徐氏》“凡例”,上海图书馆藏。

的”^①上海图书馆以及苏州各地方图书馆的馆藏家谱稍作统计。据粗略统计,仅在上海图书馆编著的《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中提及的苏州家谱即收录了76家姓氏469种家谱资料,谱籍地涵盖苏州府下属各县。此外,苏州图书馆、苏州博物馆、常熟图书馆、吴江图书馆、昆山图书馆等尚藏有为数不少的家谱资料。明清苏州家谱不仅数量众多,且种类多样,仅从名称上看,有族谱、宗谱、世谱、家谱、家乘、合谱、支谱、近谱等,或一门之谱,或一族之谱,或一支之谱,或一房一派之谱,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凝聚起家族势力。同时,家谱的体例十分完备,内容完整而丰富,明清苏州家谱基本由谱序、谱传、凡例、诰敕、历代世系图、墓图、墓志铭、祠图、像赞、家传、村居图、翰墨文章、义庄规条、家训、族规等部分组成,以世系表为经,力图展现出家族的全部生活,体现“谱乃一家之史”之义。

明清苏州的家谱中大多包含家训,《虞山郑氏支谱》《洞庭东山沈氏宗谱》等将“家训”列在卷首,足见其对家训的重视。除了家谱中所涉及的大量家训以外,尚有许多保存在文集里的家训,如清代太仓人邵廷烈所辑录的《娄东杂著》(又名《棣香斋丛书》),即存有同乡王时敏的《奉常家训》;清代太仓人赵诒琛、王大隆辑录的《丙子丛编》收录王师晋的《资敬堂家训》。此外,也有单独成篇或册的家训,如清代常熟冯班的《钝吟杂录》即收录有《家戒》《诫子帖》《遗言》《将死之鸣》四种,表达其在教子择师、律己待人、读书治学等问题上的独到看法。昆山朱柏庐的《治家格言》更是被奉为家训圭臬,集中了古人治家教子的名言警句,不但是书香世家的治家良策,同时也是整齐门风的规范。

(二) 苏州家训兴盛的原因

明清时期苏州的家训不仅数量繁多,体式多样,内容也完整而丰富,涉及个人、家庭、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究其繁盛之因,则与明清时期苏州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密切相关。

首先,修谱传统促进了家训的兴盛。宋元时期,北方战乱频繁,中原许多大族争相南渡自保。南迁过程中,许多家族不可避免地产生分化,化大为小,不复昔日聚族而居的盛况。在遭遇兵燹之后,流寓江南的北方家族一直渴望家族势力的重新团聚,家族重建意识十分浓厚,并积极付诸行动。而敬宗收族的家谱纂修是其重要手段。因而,自宋元至明清,人们普遍热衷纂修家谱,形成了家家修谱的社会风气。苏州地区虽远离战火,未有兵乱造成的大动荡,但北方士族的南迁,使得当地土著之家认识到团结对外的紧迫性与必要性,故而扩大、强化家族规模,严密家族组织,而纂修族谱家谱成为有效且直

^① 王鹤鸣:《上海图书馆馆藏徽州家谱简介》,《安徽史学》2003年第1期。

接的方法。总之,明清时期无论苏州土著家族抑或侨寓于此的北方南渡之家,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对能够“定世系,辨昭穆,别亲疏,序长幼,敬宗收族”的家谱的重视,修谱成为家族世代相接的事业。

明清苏州的家族一方面承袭由来已久的修谱传统;另一方面,所处环境的变化也促成紧迫的修谱需求,从而造成修谱风气的炽盛。承载着世家大族渴望家运长久的家训,在家族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家族祖辈们企图以家训的形式向子孙后代讲述其人生经历,传递其经验教训,灌输其精神主张,训诫子孙为家族建设事功,以收“显亲扬名,光宗耀祖,光前裕后”之效,达致家族长盛不衰的终极目的。同时,家训在凝聚人心、形成家族成员之间产生相互需要、相互依存的家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其次,经济发展为修谱立训提供了基础。明清时期,苏州人口急剧增长,商品经济繁荣,在全国的财富版图中明显处于优势地位。明代丘浚曾感叹:“东南,财赋之渊藪也。自唐宋以来,国计咸仰于是。其在今日,尤为切要重地。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①道出了明代江南赋税甲天下的事实。明人李乐更进一步指出:“天下财赋多仰东南,东南财赋多出吴郡。”^②明言苏州乃国家的财税支柱。在此背景下,涌现出许多实力雄厚的家族。他们将一部分土地、房屋等贡献出来作为族人共同的产业,设立义庄、义田、义塾,救济族中贫弱者,这些族产成为维持宗族存续的重要经济支柱。早在宋代,范仲淹即在苏州创立了范氏义庄,此后苏州的义庄代有兴废,数量不断增多,明清时期苏州成为“我国义庄最多的城市”^③。世家大族纷纷仿照范氏义庄,设立义田、义庄、义学,如长洲宋氏家族“哀田千亩,置立义庄,收租以供赡族之用,以竟先人之志”^④,制定相应的祠庄规条;大阜潘氏设立“专祭祀而恤宗族”的松鳞义庄^⑤,并订立一整套精细的“松鳞庄规条”“松鳞庄祭祀规条”“松鳞庄赡族规条”;苏州望族彭氏设立谊庄,有“三百余亩润族田”,“族人之无田者与之粟,婚嫁丧葬与之钱,鳏寡孤独之无靠者钱粟兼之”^⑥。

明清苏州世家大族的雄厚经济实力为其家谱的兴修奠定了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商品经济发展的现实也在家训中得到充分体现。我们看到,苏州不少家族并不反对甚至鼓励子弟治生,对待工商业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

再次,文化发达形成修谱立训的氛围。明清时期苏州发达的经济孕育了

① 邱浚:《大学衍义补》,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页。

② 李乐:《见闻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64页。

③ 周治华主编:《苏州全国之最》,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460页。

④ 《长洲宋氏世谱》“慈庭公祠庄原序”,上海图书馆藏。

⑤ 《大阜潘氏支谱》“松鳞庄规条·义庄”,苏州博物馆藏。

⑥ 《彭氏宗谱》“谊庄庄规”,上海图书馆藏。

繁荣的文化,文明在其肥厚的经济沃土上开出似锦繁花,簪序崇宏,书院林立,书肆栉比,藏书宏富,英才辈出,人文昌盛。尤其是科举盛况成为苏州的一大奇景,致有“状元之乡”的美誉,由此而形成不少文化世家。商品经济繁荣推动了市民阶层的形成,伴随市民势力的增长,世俗文化趋于兴盛。总之,明清时期,苏州的精英文化、世俗文化各自竞绽其流光溢彩的一面,璀璨夺目的地域文化使得苏州跃居全国的文化中心地位。

明清统治者极力推崇程朱理学,以儒家的纲常伦理来维护王朝统治,“封建统治者加强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的专制统治的需要,相应地要求作为‘国’之缩影的‘家’的统治者——封建家长也要加强对子弟家人的管束和教化,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家训的发展”^①。皇帝甚至躬身亲撰帝训,以示范民间、鼓励百姓,如朱元璋撰《祖训录》《诚诸子书》、雍正辑录康熙训言而成《庭训格言》等。这样的倡导很容易在苏州地区发生影响。因为明清时期的苏州存在大量的科举文化世家,这些士人群体十分强调诗礼传家,而“名门右族,莫不有规有训”^②,他们往往借助家训对子孙后代进行教育,通过家训传递其成功经验及精神主张。他们本身即具备很高的文化修养,故其家训往往价值很高,范家的同时也广为传诵,成为范世的标杆。有学者指出:“事实上,绝大多数家训都是口述的,成文的只是少数,原因很简单,绝大多数古代中国人是文盲。由于家训主要用以约束本家族的事务,因而在成文的家训中大多数也只在家族内流传,如附记在族谱上或作为传家物由家长单独掌管。家训要在社会上流传,不仅必须是成文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而且家训的制订者或后继者必须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家训就很难为外人所知,产生社会影响。”^③换言之,家训繁荣与否与读书入仕的士人群体有莫大关联。明清时期苏州的科举十分发达,士绅数量多、势力大。他们既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又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本身也十分注重家训的教育功能,由其书写的成文家训往往具有普遍意义,对平民百姓之家具有一定指导作用,如虞山庄氏即希望家训“爰为家人勖,并为族人勖,且为后人勖也”^④。同时,传统社会中,有着功名、官职身份的士绅阶层往往又是民间崇尚的风向标,成为普通百姓争相效仿的对象,食禄之家制定家训的举动在民间具有示范意义,以致商贾或农耕家族,也往往立有家训。因此,明清时期苏州的家训文化蔚为大观,而众多世家大族对于家训文化的繁荣实具引领之功。

由上可知,明清时期苏州的家族或是迫于外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竞争压

① 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73-474页。

② 《砂山王氏宗谱》“家训”,上海图书馆藏。

③ 徐秀丽:《中国古代家训通论》,《学术月刊》1995年第7期。

④ 《虞山庄氏续修世谱》“家训”,国家图书馆藏。

力,或是为了家族内部和谐与治理的便利,都需要“制定一整套相应的家庭行为规范来克服和对付家族的缺陷”^①,从而促成了苏州家训文化的繁荣。

二、苏州家训的形式

家训或称家范、家诫、家书、家规、家语、家仪、贻谋、宗训、宗规、族规、家则、彝训、铭箴、格言等。这些异称或由于家训作者的文化背景差异,或因其写作手法的不同,或鉴于训诫对象的特殊性,进而导致家训的文体形式也丰富异常。这在明清苏州家训中亦有突出体现。从现存苏州家训可见,仅其形式或体例即有专著体、诗歌体、散文体、训诫体等。

(一) 专著形式

专著体式的家训是以专门书籍的形式出现的。现存著名的家训专著,首推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明清时期的苏州家训中有不少即以专著形式出现。明代昆山朱柏庐的《治家格言》是一部格言体的家训专著,世俗谓之《朱子家训》,全文文句不拘长短,对偶整齐,读来顺口,听来悦耳,甚至林则徐、黄自元等诸多书法名家,都把它当成创作的素材。《朱子家训》因其意赅语浅,对仗工整,通俗易懂,清至民国年间一度成为童蒙必读课本之一。它精辟地阐明了修身治家之道,劝人勤俭持家、安分守己。有清一代之家训,以《朱子家训》最负盛名,它几乎包容了旧时为人处世的全部准则,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影响深远,被尊为“治家之经”。清代太仓王时敏的《奉常家训》,作于清代康熙九年(1670),因王氏感慨其家“年来子孙连列贤书,叔侄同登两榜,里中侈为盛事……获此厚报,益切兢凜,时刻循省,常忧满溢”^②,故有此作。家训共有“首先敦睦,省察功过,敬恭桑梓,慎收僮仆,早完国课”五款,王氏以为诸款“皆日用常行,非迂远难行之事”,一家之主则须主宰,不得偏听,则家族可福佑绵远。清代常熟蒋伊的《蒋氏家训》,撰于康熙年间,以一个为官者的口吻教育子弟,内容宽泛,涉及祭祀、孝悌、交游、为人、治家、女德等方面,全文篇幅不长,凡六十多则,包罗甚广,且多以名言警句的形式谆谆告诫族中子弟勤俭持家,以培廉洁家风。清代王师晋的《资敬堂家训》,分上下两卷,约成于咸、同之际,上卷主要是写给其养子的书信,训谕其为人、处家、为学之道,下卷则是摘录日记中的话语,抒发其关于日常生活中的人生感悟。

(二) 诗歌形式

诗歌体式的家训,以诗歌的形式教家训子,有便于记诵、易于流传的优

① 林庆:《家训的起源和功能:兼论家训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② 王时敏:《奉常家训》,收入《娄东杂著》,苏州大学图书馆藏。

点。苏州家训中的诗训既有诗又有词,体裁上更为丰富,如诗有清代长洲李果的《示两儿》,词有清代昆山王德森的《劝孝词百章》。李果的《示两儿》是写给他两个儿子的两首勉学五言诗,平易近人,亲切自然,其中有作者的自责自悔、经验教训,又有对儿子的鼓励期望,循循善诱,情殷辞切,流露出人父用心之良苦。王德森的《劝孝词百章》由一百首七言绝句组合而成,他有感于世教沦亡,陋俗百出,作此劝孝词,使儿童歌之,希闻之者能动心。其创作本意原为范家,后却刊布于世,故具范世之意义。长洲顾氏家族中的顾范在其家谱重修即将告竣之时“长夜少寐,欹枕辗转”,因而“追述祖训,作俚辞五章”,并将其附录入谱,即《述祖训诗五首》,希望能“留示儿孙,俾族之修身践言者与闻”^①。

(三) 散文形式

散文体的家训以书信、杂谈两种形式呈现,而以独立成篇的居多。苏州家训中的散文式家训有昆山《归氏世谱》中的“彝训述”,《海虞宋氏族谱》中的“家祠四训”,《沙洲孙氏宗谱》中的“孙氏家训”,《卫氏续修宗谱》中的十则家训和“宗约”,《问心堂章氏本支》中的“职方府君训言”,《吴中贝氏家谱》中的“慕庭公遗训”,《吴中叶氏族谱》中的“卯峰叶氏家训二十条”,《武山吴氏族谱》中的“述训”,《重修顾氏家谱》中的“松交公析著训言”,《周氏族谱》中的“忠毅公京邸示训”等。

(四) 训诫形式

训诫体家训一般不作理论上的论证,也少作铺陈,而以简洁明了的条款形式直奔家规主题,或劝谕或告诫,要求家人、族人共同遵守,其受训对象一般需要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苏州家训中的训诫体家训数量很多,如《东山张氏族谱》中的二十条家训,《南徐徐氏世谱》中的“十三世景寅公宗训”,《洞庭东山许氏族谱》中的八则“起文公贻谋”,《平原松陵陆氏宗谱》中的十八则“方伯公家训”和七则“澹安公家训”,《苏州庞氏家谱》中的六条家规,《吴中叶氏族谱》中的“石林治生家训要略”和“宗约说”,《歙县迁苏潘氏家谱》中的“治家规约”,《周氏族谱》中的“恭肃公家规”和“读家训规条”等。

三、苏州家训的内容

明清时期,理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分庭抗礼,虽多争执,俱对后世影响深远。苏州家训中多有体现二者的思想主张,如包山葛氏在其家训中即强调:“至于立身砥行,原非一端,岂言所能尽吾子孙,须取朱

^① 《重修顾氏家谱》“述祖训诗五首”,国家图书馆藏。

子小学反覆熟读,则修身齐家之道全备其中。”^①洞庭东山沈氏《迩言家训》则谓:“心者,一身之主宰也。五官百体之运,日用酬酢之宜,莫不由于一心。”^②

明清时期苏州地区的家训内容几乎无所不包,大体上可以分为八类,即修身、治家、治生、处世、训子、婚姻、择业和仕宦,内容十分丰富,修身治家的理念既有来自“参诸名儒”家训而承继的宝贵经验,亦有明晰世风演变之后洞悉本质的创见,寓深刻思想于浅近之语,精彩绝妙之语频出。以下择要论述。

(一) 修身观

《大学》有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题中之义,是儒者们大声疾呼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与根本。强调修身是家训的核心内容,修身的途径多种多样。儒家的修身是“内圣”与“外王”的统一,而苏州的士绅家族则忽略“外王”之学,而更多地关注“内省修身”的“内圣”之学。

1. 养生之道——养心与养气

洞庭东山沈氏的《迩言家训》开篇即语“修身”,通过“养心、正身、谨言、积德”四方面的涵养功夫展开,从内心精神世界和外在肢体言行两个维度阐述其要义。其中首重“养心”,认为“心者,一身之主宰也。五官百体之运,日用酬酢之宜,莫不由于一心”^③,与陆王心学的精神内核一脉相承。吴江周氏家族以为“人惟一心,若此心在,则事事有主;若此心放佚,所作所为,焉能觉其是非”^④。至于“养心”的途径,各家训议论纷纷,多有阐述。《迩言家训》以为,须“静时常常操存,使此心不致昏逸;动时亟亟猛省,使此心不致驰逐”,心静之时要经常执持心志,使得内心不致昏聩放逸,心动之际要急迫地深刻反省,使得内心不致驱驰追逐。只有经历如此一番涵养工夫,内心才能臻于“一真澄湛,万邪消除”的至高境界。^⑤ 但也不必将“养心”看得太难,只消做到孟子所言“养心莫善于寡欲”,清心寡欲便是“养心”直接而有效的方法。吴江周氏以为“养心”功在平时,尤其要戒掉“懈怠、放肆”这两大敌人,“故于平日,常须收敛此心,使得检点。一身之动止,正如领军一般,主将严肃,则千军万伍自听命不乱。若一懈怠,就如无了主将,这须逃兵游骑,乱扰世界,为害匪浅。收心之法,只痛戒懈怠、放肆两件而已”^⑥。海虞禄园钱氏家训中强调个人首先需要“正心”:“心术端正,保持天良,勿事欺诈,勿入邪僻,使胸怀坦白,俯

① 《包山葛氏重修世谱》“后山公遗诫十则”,上海图书馆藏。

② 《洞庭东山沈氏宗谱》“迩言家训·养心”,苏州大学图书馆藏。

③ 《洞庭东山沈氏宗谱》“迩言家训·养心”,苏州大学图书馆藏。

④ 《周氏族谱》“恒言十则示士远”,上海图书馆藏。

⑤ 《洞庭东山沈氏宗谱》“迩言家训·养心”,苏州大学图书馆藏。

⑥ 《周氏族谱》“恒言十则示士远”,上海图书馆藏。

仰无愧。”^①平原松陵陆氏有方伯公陆文衡,万历己未进士,在他所撰的《方伯公家训十八则》中即感慨道:“世界无全,圆满必生缺陷;人生无常,快乐难免愁烦。但在能自知足,故无人不自得,是圣贤安乐法。”^②

海虞宋氏在其《家祠四训》中特别强调“气训”,以为气有不同,“有道德之气,有豪杰之气,有卑鄙之气,有暴戾之气”^③。何谓“四气”?《家祠四训》的解释是:“道德之气,不刚不柔,浴沐于《诗》《书》之中,揖让于《礼》《乐》之地。强暴者,见之而畏;卑鄙者,见之而愧;豪杰者,见之而慕”;“豪杰之气,慷慨好施,磊落不群,昂昂如鸡群之鹤,臣能死君,友能死友,仗节慕义,乐善如渴,光明正大,高而不俯,伸而不屈,畏礼义不畏势利,徇公道不徇私情。有过能改,有非能受,可杀而不可辱,所谓丈夫之气也”;“卑鄙之气者,委靡不振,碌碌庸庸,或乞怜于大人之门,以取容而骄然,以傲妻子,或婉曲于侍众之前,以求悦而昂然,以欺茆独,萋菲以为才,奔走以为事,此之谓卑也;心常劬劬,眉常蹙蹙,闭户而愁,避人而食,见君子而匿影,强暴而伏迹,一文不舍,而千万为人攫去;百结缠身,而王帛贡人为欢。有乞丐之行而家富,有刻薄之心而才短。缙绅不齿,乡里共羞。此之谓鄙也”;“暴戾之气者,残忍贼害,敢作敢为,不顾公论,不惜声名,自以为雄豪,凌蹙侪类,打骂妻子,与人讦告,不胜不休,与人忿争,恃其拳力,一言不合,骂座而去,撒泼无理,乡党痛恶,此暴戾之气也”。继而具体分析“四气”之间的区别:“暴戾之气,有时慷慨自任,谓其近于豪杰,而是非豪杰也,学者自返于心,不可以卑鄙之气,自附于道德,以暴戾之气窃比于豪杰。盖豪杰之去圣贤无几,其心同而学问未醇也。卑鄙之与圣贤则大异,其才劣而心地尤秽也。暴戾之与豪杰稍似,其气类而处心悬绝也。”明晓“四气”及其区别之后,则须“自辨其心,而有以变化之,则心正气平,暴戾可化为豪杰,卑鄙可几于朴厚。凡吾子孙独坐省之,遇事察之,消其暴戾,振其卑鄙,用圣贤之心,行豪杰之事,则真贤子孙矣”。

2. 品性之道——敦厚德、守诚信、知廉耻

明清时期苏州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士绅群体,故其家训中特别重视个人的品性修养。这些读书之士极其强调“端品望”,虽身为“布衣下士”也要以“博学积行,清操砥节,与缙绅先达并驾齐名,行载郡县志中,崇祀乡贤祠宇”为追求。至于“名公钜卿”,更是“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的范世典范。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士绅们,希望塑造成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俱全的谦谦君子形象。

在敦厚德方面,家训中强调“礼”的社会整合功能,认为“礼上至朝,下至

① 《海虞禄园钱氏振鹿公支世谱》“钱氏家训·个人·正心”,上海图书馆藏。

② 《平原松陵陆氏宗谱》“方伯公家训十八则”,上海图书馆藏。

③ 《海虞宋氏族谱》“气训”,上海图书馆藏。

家,分尊卑,别贵贱,一日不可废者”^①,“人不知礼,则耳目无所加,手足无所措”^②。“礼谦下、揖退让”的礼让之德向来是儒家赞誉不绝的君子必备美德之一。昆山胡氏对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体现“让”作了一些具体规定:“同干事,则勿避劳苦;同饮食,则勿贪甘美;同行走,则勿择好路;同睡寝,则勿占床席。宁让人,勿使人让我;宁容人,勿使人容我;宁吃人亏,勿使人吃我之亏;宁受人气,勿使人受我之气。”^③常熟慈村金氏在其家训中有“礼让箴”,以为“礼以防欲,让斯守谦。范围易越,乐受针砭。争竞致祸,安免危阨。身羞由径,自远嫌疑。渊怀若谷,忿释毫纤。修齐平治,二德先兼”^④。明清时期,世人多对苏州士人的谦逊礼让、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佳公子形象印象深刻,而这实与士人们幼时即从其家训中耳濡目染“礼让”之训言有一定关联。明清时期人们为子孙后代计,或多买良田,或挑选一块风水宝地安葬,但吴县夫椒丁氏信奉唯有“敦厚德”才能给子孙带来真切的惠益,因为他们相信“德薄,祸降自天”,故而希望子孙“善敦六德,六行昭宣,知仁圣义,忠和克全,孝友睦姻,任恤惓惓”^⑤。

在守诚信方面,家训中有谓:“忠信,人之根本也。人而无信,何以为人”,君子以信而立,不可无信,“故君子寡言以成信,固忠以明信”^⑥,其在生活中对“信”的具体执行应是“凡与人订约,不可逾期;许人财物,不可食言;与人言谈,不可虚诳”^⑦。

苏州家训中对“端品行”的大量阐述,体现了明清苏州士人的精神风貌,也反映了当时苏州的社会风气。士人们抱着“纵不能造圣贤之域,亦不失为端人正士”^⑧的理想磨炼品性,深以为“士先识器,而后文艺,堂堂风采,而操履或乖,则识者鄙之,言为坊,行为表,奉教于君子,斯得之矣”^⑨。

(二) 治家观

治家,即为了使家庭生活能够正常、健康地运转而对家庭中的人、事、财等实施一定的管理。苏州家训中的治家思想大致可以分为治人与治生两个方面。

① 《东山张氏族谱》“家训”,上海图书馆藏。

② 《洞庭南徐徐氏宗谱》“附录十三世景寅公家训”,上海图书馆藏。

③ 《昆山安定胡氏世谱》“家训”,上海图书馆藏。

④ 《常熟慈村金氏家乘》“学正公箴言”,苏州大学图书馆藏。

⑤ 《夫椒丁氏宗谱》“家箴十六则”,上海图书馆藏。

⑥ 《东山张氏族谱》“家训”,上海图书馆藏。

⑦ 《洞庭南徐徐氏宗谱》“附录十三世景寅公家训”,上海图书馆藏。

⑧ 《洞庭南徐徐氏宗谱》“附录十三世景寅公家训”,上海图书馆藏。

⑨ 《砂山王氏宗谱》“家规十六条”,上海图书馆藏。

1. 治人

明清时期苏州家族的治人重点在于对族内、族外人际关系进行详细的规定。中国传统社会,有所谓“一家之亲,父子兄弟夫妇叔侄而已”,也即家族内部关系的重点在于父子、兄弟、夫妻三个关系,其他关系均是由这三者延伸出去的。要想家庭内部人际关系和谐,呈现雍穆祥和之象,“必先父慈子孝,兄弟恭,夫义妇听,长幼有序,能尽是道,永无悖逆、争斗、嫉妒之事矣”^①。

父子关系是最重要的。中国古代的家训,建立在“永怀祖德”的精神背景之上。对于远祖,有“崇祭祀、重丧葬”的规定;对于近亲,尤其是生身父母,强调一个“孝”字,并将“孝道”上升为整个社会的价值核心。明清时期苏州几乎每一个家族的家训中都涉及这一点,且列为家训之首。如《南徐徐氏世谱》“景寅公宗训八条”要求为人子者,“当常存爱敬之心。冬温夏清,昏定晨省,出告反面,有命勿逆,有事服劳,厚其奉养,体其意旨,使父母心常悦豫,方不愧子道”^②;《沙洲孙氏宗谱》所收“沙洲孙氏家训”中感念父母的养育之恩、鞠育之辛:“人生世间皆生于父母,自十月怀胎,三年乳哺,及稍长,延师训诲,成人定亲娶妇,教儿做人,望儿立业,冀儿光显,何曾一刻放下”,强调:“孝道有二,一曰安父母心,善于体贴教导,妻妾小心事奉,不违拗,不触犯,父母岂不安乐;一曰养父母身,尽我力量,饥则奉食,寒则奉衣,生辰以礼祝贺,时节以礼庆拜,有事不辞劳苦,有疾延医调治。”^③此外,不仅为子者如此,“妇事舅姑,孙事祖父母,皆如之”^④,而且对于继母、嗣父母,也该“视继如嫡,尽孝子无二”^⑤。

再如兄弟关系。“恩莫切于父子,义莫重于弟兄”^⑥,兄弟关系仅次于父子关系,“兄友弟恭”是其永恒主题。因兄弟乃“一父母所生,本同气连枝”^⑦,致有“手足”之谓。兄弟间有“一本之谊”,故应痛痒相关,不分彼此。由于兄与弟角色不同,承担的责任自然相异。具体说来,兄应爱其弟,对弟“善抚教之”,“弟有过,兄即箴规,不从,则流涕以道之”^⑧;弟虽年幼,但对兄长莫忘尊敬,“弟敬兄,善承事之”,“兄有过,弟为婉谏,不从,亦流涕以道之”。兄弟间应相互扶持,“有事相佐,饥寒相恤,有无相通,疾病、患难相顾,善相劝,过相

① 《颍川陈氏支谱》“家规录”,上海图书馆藏。

② 《南徐徐氏世谱》“景寅公宗训八条”,上海图书馆藏。

③ 《沙洲孙氏宗谱》“沙洲孙氏家训·孝父母”,常熟图书馆藏。

④ 《南徐徐氏世谱》“景寅公宗训八条”,上海图书馆藏。

⑤ 《洞庭东山沈氏宗谱》“迓言家训”,苏州大学图书馆藏。

⑥ 《洞庭东山沈氏宗谱》“迓言家训”,苏州大学图书馆藏。

⑦ 《沙洲孙氏宗谱》“沙洲孙氏家训·友兄弟”,常熟图书馆藏。

⑧ 《昆山安定胡氏世谱》“家训”,上海图书馆藏。

规,勿分纤毫”。^①不过,家训中常提及兄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时则“隔越之势既形,尔我之情遂起”的现象,而造成不和的原因“或以财,或以产,稍一厚薄,遂成争竞”,他们“小则阋墙,大则鸣宰,煮豆燃萁,自相鱼肉”,实在令人心痛,故告诫兄弟“慎勿以己私而伤一本之亲”。^②兄弟相处之道,往往受到“枕畔之风”的影响,故有家训说“兄弟之祸,大率偏听巾幗所致”^③,多半因妯娌间的私争以致兄弟阋墙,故“手足之睦必由妯娌”^④，“和妯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东山张氏家训有言：“妯娌犹兄弟也，最宜同心合意。兄弟如意，间有不睦，暗中宜规劝和好，切忌意生嫉妒，谗言唆弄，使家不和。即有贫富之分，亦须互相资助。”^⑤兄与弟要避免听从妇言挑唆和仆役外人的谗构，做到“闺帏之言勿听，挑唆之语弗从，节节件件都有个逊让”^⑥，以免“阋墙召侮，贻笑外人”。

中国传统社会强调“孝悌”，“孝悌”自然成为社会价值观的核心内容，“父兄写五伦之首，孝弟为人道之先，孝顺恭敬乃为正理”^⑦。“孝则善事其亲，弟则善事其长”^⑧，不仅是家族内部的要求，也是国家对每一个百姓的普遍要求。

又如夫妇关系。五伦之中以“夫妇为人伦之始”^⑨，“婚姻者，上以承宗祧，下以绵嗣续，事莫重焉，礼莫大焉”^⑩，故古人对待婚姻持相当审慎的态度。综观苏州家训，明清时期苏州人家的择妇、择婿标准比较强调以下几方面：家庭背景上须门当户对、家声清白；家庭教育上须温良有家法；个人性格上须醇厚，女德柔嘉、勤俭；个人生理上无恶疾。如此即便妇不美、婿不富，但只要德嘉、才贤，“虽与清白平民，或寒儒布素，结为婚姻，亦自无妨”^⑪。

2. 治生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了人们价值观念的更新，带来社会风气的变化，这种情况在苏州家训中也有较为深刻的反映。其最重要的变化是治生理念得到强化。宋代吴中叶氏的《石林家训》专门讨论过治生之道，从而使其成为强调治生的第一部家训著作，并为后世家训所借鉴。明清时期，苏州家训在保留以往家训中有关修身养性的治人经验以外，更增加了一些与日常经

① 《昆山安定胡氏世谱》“家训”，上海图书馆藏。

② 《潘氏宗谱》“家训二十四则”，苏州博物馆藏。

③ 《昆山安定胡氏世谱》“家训”，上海图书馆藏。

④ 《砂山王氏宗谱》“家规十六条”，上海图书馆藏。

⑤ 《东山张氏族谱》“家训”，上海图书馆藏。

⑥ 《沙洲孙氏宗谱》“沙洲孙氏家训·友兄弟”，常熟图书馆藏。

⑦ 《归氏世谱》“惺崖公格言”，上海图书馆藏。

⑧ 《海虞曾氏家乘》“曾氏家训·宣靖公谕家则”，常熟图书馆藏。

⑨ 《东山张氏族谱》“家训”，上海图书馆藏。

⑩ 《虞山史氏续修宗谱》“宗规二十二条”，上海图书馆藏。

⑪ 《洞庭东山万氏宗谱》“万氏家训”，上海图书馆藏。

济生活密切相关的治生理财方略,使得家训内容与现实生活的安排、经营联系更加紧密,也更加实用。

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事实上造成工商业者经济实力的增加和社会影响力的提升。以此为背景,士大夫阶层传统的“农本工商末”的观念受到了极大冲击,其对工商业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宋代苏州人袁采、叶梦得即主张,“如不能习儒,则巫医、僧道、农圃、商贾、技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①,“治生不同:出作入息,农之治生也;居肆成事,工之治生也,贸迁有无,商之治生也;膏油继晷,士之治生也”^②。他们以为,农耕不再是唯一的治生之道,工商亦可为生理之途。明清时期,这种观念的转变在苏州表现得更为明显。如虞山史氏即告诫子孙:“凡人以治生为急,士农工商所业不同,生理则一,为父兄者,量子弟之才质而教授之,则生理易就。”^③虞山庄氏视子弟资质而定其生业,“吾族子弟能文者,俾读书;能武者,俾习武。否则或农工或商贾,总以授有执业为本”^④。洞庭东山沈氏要求“凡子弟到了十六七岁,看其资质,不能读书,农工商贾,必习一业”^⑤。苏州潘氏在劝其子孙立家业之时也提到“或服贾营生”^⑥。砂山王氏在子弟“不得可教之”时,“令习一手艺”,如此“便有生涯,不致为非”。^⑦当然,他们对工商治生的态度颇为复杂,有的实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如一些家族相较工商治生而言,最担心的其实是子弟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如果读书难以上进,那么经商、习艺则无不可。苏州张氏在其家训中即表达了这样的心声:“一人有一人之业,士以读书为业,商以懋迁为业,必有其业,然后心思有所归宿,手足有所寄托,自然不至为非,否则游手好闲,渐至下流,而不可复返矣。”^⑧而更多的家族则是应因商品经济发展的现实和社会变化所作出的谋生方法的调整。

(三) 训子观

家训是针对家族子孙的,因而“训子”是家训的重点。从苏州家训中可以看出家族的追求与发展理念。

苏州家训中的训子言论,最为强调读书,要求子孙以读书为务。明代周氏恭肃公启迪子弟的第一件事即是读书,“子弟第一以读书为本”^⑨;昆山归氏

① 袁采:《袁氏世范》,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40页。

② 《吴中叶氏族谱》“石林治生家训要略”,苏州大学图书馆藏。

③ 《虞山史氏续修宗谱》“宗规二十二条”,上海图书馆藏。

④ 《虞山庄氏续修世谱》“家训”,国家图书馆藏。

⑤ 《洞庭东山沈氏宗谱》“迓言家训”,苏州大学图书馆藏。

⑥ 《潘氏宗谱》“家训二十四则”,苏州博物馆藏。

⑦ 《砂山王氏宗谱》“家训”,上海图书馆藏。

⑧ 《苏州张氏家谱》“家训”,上海图书馆藏。

⑨ 《周氏族谱》“恭肃公家规”,上海图书馆藏。

《松期公训言》中说：“以读书为本，学问有成，上可以建功立业，显亲扬名，下可以明理达道，议事知务。”^①在他们看来，读书方能知晓道理，对持身涉世、人情练达、事业有成关系甚大，“读而知理，于为人出仕，俱大有益”^②。他们强调“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③，故而在家训中反复向子孙灌输读书业儒仕进的观念，期望子孙通过仕进之途以显亲扬名、世代相守家族的繁盛，“子弟能读书者，乃显亲扬名之梯筏也，父兄所期惟此耳”^④。

本着读书入仕的家教理念，教子孙的第一步即延师训读，指出“延师训子，此蒙养之要”^⑤；子弟须择明师教诲，而明师的标准大致包括“人品端方，学问渊博，可为子弟仪范”^⑥，“有德饱学，师范严明，有坐性，少交游”^⑦，“博雅敦厚，束脩自好者”^⑧。明师授业的内容自是四书五经，注重“礼”的传授：“勤讲习，衍通四书本经，兼读余经正文，熟诵秦汉唐宋大家之文，然后课以制艺，规仿行文”^⑨，“《诗》《书》《礼》《乐》，朝夕训诂”^⑩，“小学幼仪，日与讲习”^⑪，“清其字音，正其句读，严立课程，使知所向”^⑫。

不过，苏州的家族比较现实，并不一味地逼迫子弟读书，而是视子孙贤愚程度作出选择，对于“质地过人，精采焕发者，须令读书玩文”^⑬，“英敏子弟使之力学”。而对于禀性拙钝、不适合走科举仕宦之路的子弟，父兄则认为“莫将举业久担”，不必徒废光阴，不以仕途为唯一出路，而应使其“早令练达公私百务”^⑭，或农桑，或商贾，或书算医伎。

明清时期苏州家训中关于“训子”的言论充分体现了父兄长辈对子孙成材成器的良苦用心，实可谓“爱子之道至深远”。既有对子弟读书应举的劝学、勉学之言，亦有对子弟品行气质的训导，小到日常坐立之姿的教育，大到立己持身、习艺治家的导引，循循善诱其做个体面之人，希望子孙能“致力于人品、学问二端。人品既高，学问又到，则士林推重，乡党共钦，虽不爵位已极

① 《归氏世谱》“松期公训言”，上海图书馆藏。

② 《周氏族谱》“恭肃公家规”，上海图书馆藏。

③ 《武山吴氏族谱》“咏风堂纂训”，上海图书馆藏。

④ 《虞山史氏续修宗谱》“宗规二十二条”，上海图书馆藏。

⑤ 《橘社金氏家谱》“桐溪公家训十五条”，上海图书馆藏。

⑥ 《橘社金氏家谱》“桐溪公家训十五条”，上海图书馆藏。

⑦ 《洞庭东山沈氏宗谱》“迩言家训”，苏州大学图书馆藏。

⑧ 蒋伊：《蒋氏家训》，苏州大学图书馆藏。

⑨ 《许氏族谱》“起文公贻谋八则”，国家图书馆藏。

⑩ 《夫椒丁氏宗谱》“家箴十六则”，上海图书馆藏。

⑪ 《沙洲孙氏宗谱》“沙洲孙氏家训·教子孙”，常熟图书馆藏。

⑫ 《潘氏宗谱》“家训二十四则”，苏州博物馆藏。

⑬ 《包山葛氏重修世谱》“后山公遗诫十则”，上海图书馆藏。

⑭ 《橘社金氏家谱》“纂训”，上海图书馆藏。